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1月31日（第254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拜登政府应明确对华政策目标

美国当今全球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一个由规则而非蛮力支配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一总体思路。

中美关系

美学者建议美采取网络行动“保卫”台湾

美国法律事务 (Lawfare) 网站 1 月 13 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高级研究员科隆·柯钦 (Klon Kitchen) 等人的文章称, 台湾地区不仅是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支点, 也是中美技术竞争的节点。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 以确保美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掌握技术层面优势。文章摘要如下:

在中美科技竞争中, 台湾地区在两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 台积电拥有制造目前最复杂的计算机芯片的独家能力。台积电生产的芯片是推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也是美中技术竞赛的关键。台湾地区一直试图构建针对大陆的“硅盾”, 以威慑大陆。但是, 对美国设计芯片更严格的限制, 阻止了大陆获取台积电和其他生产商生产的先进芯片, 这导致“硅盾”瓦解。

其次, 网络战将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几十年内, 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更多表现在网络领域。台湾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高度数字化, 来自大陆的网络攻击恐导致灾难性后果, 使台湾地区陷入混乱。美国应与台北合作, 在网络战联合演习的基础上, 尽快找出台湾地区网络中的潜在威胁。美国在信息空间帮助台湾地区防御很可能不会打破台海目前微妙的政治平衡, 反而能进一步威慑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并获得应对未来网络冲突的宝贵经验。

美专家为美国如何应对中伊交好支招

美国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网站 1 月 14

日登载该智库中东事务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菲利普斯 (James Philips) 的文章称,自去年3月中伊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后,两国日益交好的关系增强了伊朗抵抗西方制裁的能力,缓解了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有助于其实现地区霸权。

作者建议美国利用中伊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提高两国交往成本,降低经济利益,并通过与盟友合作来限制中伊关系发展,化解地缘政治危机。文章提出的建议包括:

第一,升级对伊制裁。恢复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不仅能增加美伊达成较理想核协议的可能,还能降低伊朗购买中国商品的能力,从而削弱对伊贸易给中国带来的预期利益。

第二,向中国施压,敦促其减少对伊朗现政权的支持。若中国无法鼓励伊朗签署核协议,伊朗很可能会继续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恐扰乱石油的生产和出口,损害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能源利益。

第三,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实施制裁。拜登上台后,中国增加了对伊朗石油的进口。美国应对该能源贸易链条中的航运网络和中国公司实施新制裁。

第四,与盟友合作,削弱中国对伊朗的支持。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之间的经贸交往远超伊朗。拜登政府可以利用这些盟友国家来提高中伊交好的成本和风险。

美国人对华态度存在代际差异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CGA) 网站1月14日登载该机构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助理主任克雷格·卡夫拉 (Craig Kafura) 的文章称,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愈发消极,包括年轻一代。相较而言,美国青年不倾向于就中美关系下明确定论,

或将中国视为威胁，并更有可能反对限制两国之间的科教交流。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年轻一代对美国军事实力普遍抱有信心。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1-1996 年间）超过 50% 的人认为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 Z 世代（出生于 1997-2012 年间）中 44% 的人认为中美军事力量大致相同。相反，美国老年人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信任危机。但当谈到美国的经济实力时，美国老年人比美国年轻人对国家更有信心，年轻一代普遍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势均力敌。

其次，美国年轻人不太支持限制中美交流。代际群体间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差异会延续到具体政策领域。总体而言，年长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支持限制中美两国交流。大多数出生于沉默世代（1928-1945 年）、婴儿潮世代（1946-1964 年）和 X 世代（1965-1980 年）的美国人支持大幅减少中美贸易往来，即使美国消费者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年轻人在该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代际差异同样体现在科教领域。多数美国老年人赞成限制中美科教交流，严控中国留学生人数，而千禧一代则明确反对这种限制。

尽管代际之间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有分歧，但这几代人一致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而非安全伙伴。对中国意图的怀疑可能是促使人们敌视中国的主要因素。

FP：美应加强与柬埔寨和老挝接触以应对中国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 1 月 12 日登载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本身以及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不平衡，忽视了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虽小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美国能将势力打入柬埔寨和老挝，它就能把战略竞争带入中国的“后院”。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削弱一种持续的叙事，即面对中国几乎不可避免的崛起，美国只是在印太地区被动应对和防御。这种叙事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构成了强大的阻力，甚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产生了怀疑。通过加强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接触，美国不仅能扭转中国即将主导东南亚大陆的叙事，也有助于它加强与泰国和越南的关系。

然而，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与柬埔寨的互动既糟糕又无效，而老挝则完全被忽视了。这两个国家的案例，能够帮助拜登政府检验其优先事项之一——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否会削弱另一个优先事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这两者间不一定相互排斥。从历史经验来看，纯粹基于价值观的方法显然未取得进展，反使美国在该地区陷入孤立，并且非必要地向中国让出“地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标准已经放松，但对柬埔寨和老挝却没有。越南的人权记录不佳且日益恶化，但却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棋子。越南的例子证明，只要美国愿意，它可以在印太地区兼顾价值观和务实合作。对于重视价值观的拜登政府来说，柬埔寨和老挝作为合作伙伴的吸引力较低。但这些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拜登政府可以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伙伴合作，共同推进柬埔寨和老挝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直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

就目前而言，美国应该首先避免与柬埔寨和老挝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积极寻求与两国建立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任何进一步的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都会适得其反。拜登政府应通过重新包装与两国的对话，而不是通过说教和训斥来坚持其对价值观的关注。为了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还应寻求与柬埔寨和老挝展开高层政治交流，以促进新的经济和安全协议。

美专家：拜登政府应明确对华政策目标

美国当今全球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一个由规则而非蛮力支配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一总体思路。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1月14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的文章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缺乏目标。若没有明确目标，任何战略都可能是浪费资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竞争只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状态的描述，并非目的。冷战后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总体上是明确的，即以接触推动合作，并从中国内部促进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然而，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其政府既不寻求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也不寻求将对华接触作为确保美国利益的核心手段，从根本上建立了对华竞争关系。

美国当今全球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护一个由规则而非蛮力支配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一总体思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不该是阻止中国崛起，或是将中国变成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是应确保中国不愿或不能“颠覆”地区和全球秩序。中国对全球规则和规范的态度存在差异，并非寻求简单地废除和取代现有的原则。美国应聚焦那些对美国利益最重要，同时最易受中国行为威胁的领域。

基于此，美国对华新中期政策的具体目标应该是：寻求提高美国在印太地区相对于中国的军事地位；反对中国使用经济胁迫，减少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建立新的技术伙伴关系，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动；并将现有联盟的重点放在保护民主国家免受外部干涉上。比起开展严格的对华竞争，美国更愿意努力维护和扩展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并不寻求压制中国崛起，而是寻求

建立中美长期平衡。

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正从美国及其盟友转向中国，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越来越强，而美国在贸易方面并不真正具有领导地位。尽管与中国合作是可取的，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但双方合作的领域有限。要扭转这一趋势绝非易事，需要数年时间，但外交接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美国需要接受中短期内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会加剧的事实，以便在长期与中国实现更稳定的平衡。

美国外交

CSIS：2022 年美印关系的五大关键议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 1 月 13 日登载该中心美印政策主任理查德·罗索 (Richard M. Rossow) 的文章，展望了 2022 年可能影响美印商业和战略关系的五大关键议题。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CAATSA) 是否豁免印度。印度正在接收首个俄制 S-400 凯旋防御系统，并可能在二月底投入使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是否给与印度豁免，使其免受 CAATSA 的制裁。但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持续威胁表明，豁免并非美印双边问题。获得豁免的途径相当狭窄，且美国国内在是否豁免印度问题上存在分歧。

第二，印度人民党 (BJP，简称印人党) 在关键邦的选情。今年即将举行选举的七个邦中有六个是由印人党掌控。由于过去五年中，印人党在邦选举中的连任率徘徊在 42% 左右，印人党对各邦的控制可能受到严重削弱，这或许会导致印度政府再次放弃

推动经济改革，将精力转向短期政治议程，而这往往会导致印度与美国等伙伴产生新摩擦。

第三，恢复主要双边对话。虽然美印关系在 2021 年迅速发展，但几个最重要的双边论坛——尤其是“2+2”部长级对话——尚未举行。今年即将举行的“美印企业首席执行官论坛”有望帮助推动一项将增进双边商业关系的议程。如果两国公司积极参与，两国政府能响应论坛提出的主张，该论坛就能够成为打破商业障碍的有力工具。

第四，印度和 G20 峰会。印度将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今年的 G20 将聚焦卫生、数字化转型和能源转型等议题。印度在普惠金融和数字治理工具等领域的成功可能成为议程的核心部分。美国支持印度提出的议程将极大加强两国关系。

第五，印度能否如期达成 175 吉瓦 (GW) 可再生能源目标。2015 年，莫迪政府宣布到 2022 年底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175 吉瓦的目标。但截至目前，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刚过 100 吉瓦。印度若不能如期达成目标可能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担忧。

美国亚洲贸易参与应重点关注安全议题

美国东亚论坛网站 1 月 9 日登载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 (Gary Clyde Hufbauer) 等人的文章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参与应重点关注安全领域。

文章称，拜登政府将参与印太事务置于外交战略首位标志着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出现新转折，但现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接触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第一，政府内部无法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形成统一战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国务院和商务部共享亚洲贸易政策制定权，各部所持观点不同，彼此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直接

导致空谈多、行动少。

第二，中国在印太贸易中的参与度和竞争力远超美国，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正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在印太地区成功的经济接触依赖于“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它却不足以取代“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者缺乏约束力和贸易投资自由度，而后者更具可行性且能为其成员带来实际收益。美国虽极力反对中国在 CPTPP 中的领导力渗透，却无法提出更优的替代方案。

第三，美国实现对华最强制衡，“印太经济框架”发展的最佳前景在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将社会问题纳入贸易协定的行为表示，气候变化、工人权利和数字经济将成为“信息太平洋经济框架”（Info-Pacific）的重点议题。试图通过贸易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新鲜，若美国无法做出重大贸易让步，印太国家就无动力就解决社会问题做出硬性承诺。然而，这些国家可能会被美国政策中体现的安全色彩所吸引，因此，拜登政府新亚太经贸政策应集中力量在安全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

美学者建议在欧洲建立新安全秩序

美国《政客》杂志（Politico）网站 1 月 10 日登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杰出研究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等人的文章称，美俄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阻碍了双方围绕欧洲安全的谈判进程。虽然美俄会谈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乌克兰危机，但也为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个创建泛欧洲安全秩序，降低欧洲危机和冲突风险的机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美国处理对俄关系的出发点是承认两国关于欧洲安全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源于两国对国家认同和治

国之道的概念差异。因此，双方要尽量避免就此进行无效辩论，而应该关注缓解紧张局势和促进稳定的具体步骤。

其次，美俄谈判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双边会谈。尽管拜登政府强调盟友和伙伴的参与度，但多边谈判可能导致谈判进程停滞不前。并且，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美俄两国达成协议的能力和克制行动的意愿。

再次，美国在对俄谈判中无需满足对方所有要求。原则上，美俄在以下几个领域能够在不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情况下达成互利协议：一是重启美俄双边渠道和多边渠道的例行对话机制。俄罗斯和北约均有避免危机事件的意愿，为了防止近距离接触升级，美俄应讨论军事演习的透明度以及边境驻军等问题；二是承诺不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当前，虽然美俄双方没有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系统的战略或军事紧迫性，但若美俄愿意做出政治承诺，具体的技术性方案就不成问题。

最后，上述问题的解决能够为美俄解决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北约扩张和僵持的地区冲突——赢得时间。一是北约东扩问题。美国及北约盟国已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俄罗斯要求北约正式放弃东扩的要求。俄罗斯可能愿意接受以 20 或 25 年为期，暂停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的条约。二是欧洲持续僵持的地区冲突通常涉及分裂主义。西方和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定义欧洲合法自决行为的标准、要求和程序，这可能会在形式上应用于科索沃和克里米亚冲突，以及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

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旧安全秩序正在承受巨大压力，当下是构建更新更持久秩序的时刻。在不牺牲美国核心利益和原则的情况下建立欧洲新安全秩序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种绥靖行为，而是使美国和欧洲更加安全的成熟的治国之道。

美应在印太地区加强被动军事防御能力

美国 War on Rocks 网站 1 月 10 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国防项目主任斯塔西·佩蒂约翰 (Stacie L. Pettyjohn) 的文章称, 美国应在印太地区建立具备被动防御能力的弹性态势。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当前的全球军事发展面临困境。首先, 中东战争阻碍了美国平衡其太平洋军事能力的步伐; 其次, 考虑到未来印太国家基地准入的不确定性, 美国防部加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的态度模糊不清; 最后, 美国缺乏一套新的作战概念和方式。

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长期的军事竞争, 双方都希望获得优势。中国已拥有大量远程精确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够破解美国现有的防御系统, 这大幅增加了印太地区美军面临的风险。因此, 国防部应加强地区军事弹性。受制于现实状况, 短期内可行的措施是分散美军部队, 加强现有基地的被动防御系统, 降低美军对华脆弱性。拜登政府时期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虽然展现出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向印太转移的态势, 但未能兑现国防部专注于中国的承诺, 更多是为了修复盟友关系。面对当前的印太军事态势, 美国防部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基于此, 文章认为应增强美军在该地区的被动防御能力。被动防御指的是通过提高承受打击, 恢复和继续执行关键军事行动的能力。通过将多样化的主动和被动防御措施相结合, 最大限度地减少攻击造成的损害。对美军来说, 这是一项有效且可负担的措施。具体而言, 美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印太地区的被动防御能力:

第一, 美国应获得更多基地的使用权, 改善第一岛链及更远地区现有基地的基础设施, 实现分散式作战。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似乎都准备在和平时期为美军提供额外的基地准入，虽然这并不能保障在危机或战争时期美军有权使用这些基地，但能够为中国的军事计划制造不确定性。新基地对美国而言不仅能完善后勤枢纽，预先储备关键弹药，还能增强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第二，在现有基地和新基地上部署多种被动防御设施。美国应采取措施混淆对手视野，使其难以有效瞄准基地设施。相关举措包括分散基地内的武器平台、弹药储备和关键的后勤保障系统，选择性地加固关键设施，并提高受攻击后的恢复能力等。

印太局势并非无望，战争也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但美国需要在未来五年内采取措施加强威慑能力。并且，通过增强被动防御系统来提升军事弹性。

美国政治/其他

通胀将对民主党选情带来重大影响

1 月 14 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等撰文，分析了美国当前的通胀对民主党选情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

通胀对低收入和高收入美国人的影响存在差异。一项盖洛普民调发现，71% 年收入低于 4 万美元的家庭表示，通胀给他们带来了一定或严重困难，而对于年收入高于 10 万美元的家庭来说，该数据仅为 29%。教育程度影响收入，进一步影响其对通胀的感知。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13% 的人表示通胀给他们带来了严重困难，40% 的人称通胀给他们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这两项数据仅为 4% 和 26%。

受通胀影响较大的人群也是那些在过去两届总统选举中投

下关键摇摆票的选民。年收入低于 5 万美元的选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 2018 年中期选举中占选民总数的 38%，在 2020 年大选中占 35%。拜登赢得 2020 年大选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战场州”工人阶层白人选民中的选情改善。事实上，在多数“战场州”，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的数量超过了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的总和。鉴于并非所有少数族裔选民都投票给民主党，为了在中期选举能保住参众两院中的至少一个，民主党人必须争取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的选票，同时扭转西班牙裔工人阶层支持者流失的局面。

民调显示，当前超半数美国人都将物价上涨的速度视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最佳指标。拜登必须树立努力控制通胀和制定关键经济立法的形象。拜登虽无法控制美联储，但他可以通过疏通供应链来影响商品和服务供应。

2021 年美国选民的政党偏好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 (Gallup) 高级编辑杰弗里·琼斯 (Jeffrey M. Jones) 1 月 17 日撰文称，在 2021 年，美国人的政党认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季度，民主党占九个百分点的优势，但到了四季度，共和党罕见以五个百分点的优势逆袭。

2021 年美国入政党偏好发生转变的原因可能与特朗普和拜登担任总统时受欢迎度的变化有关。特朗普卸任时的支持率为 34%，是其任期内的最低水平。拜登上任后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直至初夏都保持在高位。此后，德尔塔病毒导致的感染病例激增、阿富汗的混乱撤军和持续的通胀导致拜登支持率持续下降。

在一季度，由于特朗普的支持率位于低位，而拜登相对受欢迎。彼时，49% 的美国人认同或倾向民主党，40% 的人认同或倾向

共和党。二季度，民众对民主党的认同比例保持在高位，而对共和党的认同开始恢复，增加到 43%。三季度，拜登的支持率开始动摇，民主党的支持率从 49% 下降到 45%，而共和党的变化并不明显。四季度，共和党的支持率从 44% 上升到 47%，民主党的支持率从 45% 下降到 42%，两党的态势发生了翻转。

2021 年各季度，特定政党的核心支持者和独立人士的政党偏好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后者的变化更大。在 2021 年，平均 29%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27% 的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42% 的人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倾向民主党（17%）和倾向共和党（16%）的独立人士的比例大致相等。

独立人士仍是美国最大的政治团体。过去十年来，独立人士的比例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自 2011 年以来，除了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年外，至少四成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但在 2011 年之前，独立人士的比例从未达到 40%。

在 2021 年初，民主党的优势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到了三季度，随着拜登支持率持续走低，民主党的优势开始减弱。在四季度，政治风向继续对共和党有利，这使共和党获得了 25 年来的最大优势。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政党偏好将成为哪个政党能够获胜的关键指标。

美机构分析民主党在工业郡的选情

21 世纪民主党人（21st Century Democrats）网站近日发布报告，分析了 2012-2020 年间，民主党在美国 10 个州工业郡中的选情。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政治中只有三类关键政治地盘：民主党占优势的大城市，共和党占优势的农村地区，以及摇摆选民占多

数的郊区，因此政党应该花大部分时间争取郊区。但是，该分析忽略了美国选区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制造业密集的工业城镇。这类工业城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人口大于 3.5 万的中型城镇，和人口少于 3.5 万的小型城镇，它们囊括了 40% 的美国选民。

通过对 10 个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和纽约州北部——的 853 个郡进行研究，报告发现，2012-2020 年，民主党在大城市及郊区的优势掩盖了民主党在这些郡损失的选票。报告关注的 10 个州都是传统的工业中心地带。这些州在 2008 年大选中大幅向奥巴马倾斜，在 2016 年大选中又倾向于特朗普，助他赢得选举人团票而入主白宫。拜登在 2020 年大选中同样在这些州赢得了足够的选票，从而获胜。

尽管两党候选人关注不多，但这些工业城镇占主导的郡的选民占总体选民的比例并不低。在报告关注的十个州中的八个州，工业城镇占主导的郡的选民数量，占这些州选民总数的比例超过 40%，有四个州的比例高达 57%，甚至更多。在密歇根州，这些郡的选民占该州选民的半数，在明尼苏达州则接近半数（49%）。

最重要的是，2012 年以来，虽然民主党在上述十州的大城市和郊区增加了超过 150 万张选票，弥补了民主党在农场主导的农业郡损失的 55 万张选票，但却远不能填补民主党在中小制造业郡损失的 260 多万张选票。

报告认为，民主党在制造业郡选票的流失存在多重原因。首先，通过研究 2001-2020 年间制造业就业的流失发现，在中小规模制造业郡中，20 年前对制造业的依赖越大，那里的人对制造业就业损失的感受就越强烈，在投票中转向共和党的比例就越大。

其次，通过研究这些郡的经济、卫生和人口数据发现，高失业率和社会福利削减促使这些郡转向了共和党。2012-2020 年，

309 个制造业就业流失和医保削减的郡中有将近 100 万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其中，284 个是中小型制造业郡。

最后，报告研究了这些州工会会员减少带来的影响。这十个州在 2001-2020 年期间失去了超过 42 万名工会会员，占全国工会会员流失总数的 93%。在一些州，仅 2010 年失去的工会会员就远超拜登领先的票数优势，这意味着如果共和党没有蓄意破坏工会，拜登会赢得更轻松。

如果民主党在工人阶层占多数的中小制造业郡中的情况继续恶化，那么民主党无法在选举中赢得这些位于工业中心地带的“战场州”。倘若民主党人开始关注这些地方，并制定改善这些地区选民生活的政策和政治战略，就有望在这些地区获得更多选票，并赢得更多选举。

卡托研究所评估美国军售风险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近日发布报告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武器出口国。2020 年，美国军售占全球武器市场的 41%。但是，军售的风险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历来低估的因素。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为军售“松绑”导致美军售风险上升。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客户群的平均风险较前两届政府大幅上升。例如，特朗普政府修订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CAT)，强调军售的经济利益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简化军售流程，以加快审批和交付。2018 年，特朗普政府放宽了武器出口规定，将许多“非军事”物品从美国军火清单上 (USML) 的第 I-III 类移除，转而列入商业管制清单 (CCL)，包括枪支、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弹药，允许这些物品通过直接商业销售流程出售。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批准了绝大多数特朗普政府同意向沙特阿拉

伯出售的武器，并批准向埃及、菲律宾和以色列出售武器。此外，拜登政府至今还未发出重新签署《武器贸易条约》的信号，也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有关无人机出口的政策。

根据美国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安全援助监察项目（Security Assistance Monitor）发布的数据，美国在 2020 年通过对外军售程序促成了价值超过 1430 亿美元的军售，比 2019 年增加了 59%。从军售总价值的角度来看，军用飞机及其相关部件在过去两年中占据了美国军售的大部分，炸弹和导弹排在第二，地面车辆排在第三。然而，某一武器类别的销售总额并不一定是衡量其风险或收益的最佳指标。例如，尽管军用飞机可以用于国家间战争、内战或针对恐怖组织的空袭，但军用飞机的转手风险是最低的。另一方面，虽然小型和轻型武器的军售金额远低于军用飞机和导弹的金额，但前者的转手风险很高，且会造成更多的暴力。

今后，美国应该在军售审查过程中更全面地考量军售的风险。首先，美国应停止向风险最高的国家销售武器。其次，调整现有的法律，使所有军售都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而不是像目前的模式那样，国会只能投票否决通过对外军售流程进行的交易。再次，美国应重新考虑通过直接商业销售机制出售小型和轻型武器的做法，将大部分此类销售重新纳入国务院管理。鉴于小型和轻型武器在许多国家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小型和轻型武器销售首先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最后，美国应该通过《2021 年武器出口人权保障法案》（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in Arms Exports Act of 2021）或类似的立法，加强对这些武器最终用途的监控，并授权相关机构在军售过程中关注人权问题。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